

广播电视探析

赵水福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自序

我于1960年步入广播电视界，算来已经32年。如果从1950年(当时17岁)担任《苏南日报》、《大众日报》特约通讯员算起，接触、学习、从事新闻工作已经40多年。而如果从1953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算起，学习、从事新闻工作也将近40年了。看来，我这一生是许给了新闻战线，许给了广播电视。

1960年，我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回国后，组织上分配我到国际广播电台搞对苏广播。在国际广播电台，一干就是25年，当过记者、编辑、俄语组副组长、苏联东欧部副主任、俄语部副主任、国内新闻部主任。我对国际广播工作是十分热爱、相当投入的，对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较有体会。因此，从1979年起，便边从事繁重的编采业务，边撰写业务研究文章。此外，我丢不下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学习的列宁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并且随着我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越发感到列宁这份遗产的重要。于是，我在研究国际广播的同时，也研究列宁新闻学。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汇集成《国际广播探析》、《列宁与新闻事业》(合著)。

1985年9月下旬，我应邀到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授课。回京后，见办公桌上有一字条：“部平南副部长找您，嘱尽快与他联系。”次日，我去找平南同志。他说：“部党组决定调你到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希望尽快到任。”我感到突然，但事已决定，只好服从。

这次调动是我一生中的重要转折。我多年熟悉的业务，慢慢地闲置起来了；我不熟悉的业务，等待我去学习、探求。但我有一条是沾光的：研究工作对我来说并不完全陌生，我喜欢这项工作。如今，在这个岗位上，一晃差不多七年了。记得到政策研究室不久，在一次会议上，我当众谈了自己的心愿：政研室争取一年小变样，三年中变样，七年大变样。现在，七年即将过去，“大变样”看来不尽人意。但比之七年前，政研室还是显著地变了，广播电视系统的研究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人们说“这一时期是广播电视史上研究成果最多、研究工作最兴旺的时期。”而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广播电视探析》，比较完整地、准确地反映了这项工作的进程和概貌。

这本集子收集了45篇研究文章。几乎全是到政策研究室（1988年改称政策法规司）以后写的。为便于读者阅读，我把它们归了归类，分成五篇：“视听研究篇”、“决策研究篇”、“研究工作篇”、“新闻自由篇”、“苏联传媒篇”。下面，对这五篇的内容作简略的介绍、说明。

“视听研究篇”收集了7篇文章，都是谈宣传业务的。我把《什么是新闻》放在本书的开篇位置，一是因为它是我到政策研究室前不久写的，体现了研究工作的连续性；二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当时的新闻观点和研究水平。其后的6篇文章，有3篇是研究国际广播的。人们常说，作研

究工作最好要有实际工作的经验，这话不假。我从事对外广播25年，写这三篇文章，自觉比较轻便。但同时意识到，我对这个问题的系统研究该打上句号了。因为客观实际变化很快，不直接参加对外广播的实践，很难再发表中肯的、有指导意义的见解了。如此看来，这三篇文章，很可能是我比较系统地研究国际广播的一个小结。在“视听研究篇”中，收有《我国广播电视工作改革》一文。它汇集了1988年6月前我国广播电视改革的简况，介绍了宣传改革的成功经验，对于当前广播电视深化改革有一定参考价值。

“决策研究篇”收集了9篇文章，谈的都是我过去不熟悉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面宽，政策性强，且多是我国广播电视战线众说纷纭、难点较多、急需探寻解决途径的问题。录像业怎样才能健康发展，农村广播电视建设如何加强，“四级办”广播电视的方针要不要完善、如何完善，管理体制如何改进，对经济电台如何评价、引导，对“和平演变”问题如何看待、掌握，广播电视改革如何深化？……对上述问题，“决策研究篇”都作了一定的回答。这些回答不见得都很完善，但我是抱着从实际出发、力求回答现实中的问题、力求给决策部门提供可靠根据的态度来从事这些研究和写作的。有些问题，比如广播电视如何深化改革，是本系统许多同志在思考的问题，但人们往往只是结合本单位工作谈一些具体设想，而认为从宏观上提出思路、重点是基层单位和具体工作部门力所不及的事。这种形势促使我从宏观上思考。经过一番思索，我提出改革的总的思路是“按广播电视传播规律办事”，并且具体归纳了传播规律的内容。我相信，这对广播电视深化改革是有益的。有些问题，人们天天接触，经常挂在嘴边，但说不清楚它们的确切内容。比如，

人们常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但“特色”在哪里，哪些内容称得上中国特色，往往说不清楚。这就需要研究，需要根据广播电视的实际从理论上概括。我知道，我现在做的概括是很初步的，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毕竟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开了个头，抛了块“砖”，相信能引出“玉”来。倘若如此，我的脑筋就没有白费。

“研究工作篇”收集了18篇文章，是本书各篇中文章最多的一篇。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在政研室的各项工作中，我在这方面花的精力最多。政策研究室是广播电影电视部分管研究工作的管理部门。鉴于我部没有直属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它又肩负一部分研究工作的职能。作研究工作，需从基本建设抓起，需有图书资料，我们决定与北京广播学院合作先抓《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的编辑出版。接着，我们抓了调研课题规划，一面抓政策研究，一面抓理论研究，并决定组织撰写《中国广播电视学》。这期间，政研室陆续调进一些年轻的研究人员。他们出了不少成果，对政研室的工作作出了贡献。但光靠十来个专职研究人员不会形成大的气候，何况这十来个人中还有一些同志在搞法规。于是，我们把久议不决的成立“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事正式提交部党组审定，结果1986年10月成立了目前已拥有1万多名会员的学会。政策研究室与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结合，把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推上新新的阶段。我担任副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和担任主编的《广播电视决策参考》问世了；我主编的《广播电视决策研究文集》、大型画册《半世纪的历程》、亚运宣传效果调查报告集《中国社会心理的轨迹》问世了，我担任副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学》问世了；全国50多家业务探讨、理论研究刊物和近100种广播电视专业书籍

先后问世了。广播电视研究工作开始出现繁荣的局面。为了不失时机地把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推向前进，去年我在一文中提出“把广播电视研究推向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的新阶段”。这一倡议，在今春召开的“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上被响亮地再次提出，并写进了会议纪要（部党组已批转全国广播电视系统）。这次会议制定了全国广播电视“八五”研究课题，有关单位和人员分工合作，从而使“群体研究与个体研究并举”的构想变成了行动。这期间，我对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和决策研究还提出过若干意见。所有这些，在“研究工作篇”中，都有具体的反映。

“新闻自由篇”收集了5篇文章。这些文章是针对新闻界、广播电视界两种情况写的：一种情况是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企图在我国推行这种自由；另一种情况是对新闻自由非常冷淡，甚至有点惧怕。这两种情况，都源于对新闻自由的产生、发展、不同的性质和作用缺乏认识。因此，上述几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这一问題。1989年前，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着力于对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剖析。1989年北京出现政治风波，新闻界的某些不正常现象使我清楚地看到：光剖析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实质，还不足以说服有关同志。要帮助他们处理好这一问题，必须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不久，我又发现，光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还不够（因为人们对什么是新闻自由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要在正确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必须找到评判究竟什么是新闻自由的客观标准。我试找了这种标准，提出“得到法律和经济保证的符合社会和自然发展规律的新闻活动就是新闻自由”。我认为，这样似乎把新闻自由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苏联传媒篇”收集了6篇文章。其中，介绍列宁论经济报道的两篇对我们做好经济报道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苏联广播电视考察报告》是我1988年访问苏联的成果。它全面地、具体地反映了苏联广播电视到这期间的发展状况。我国的一些老广播说这个《报告》“对认识隔绝30年的苏联广播电视立了一功”。其后，苏联广播电视开始发生变化，这在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苏联电视广播机构改组》中也有所反映。

以上45篇文章，除二篇外，均在刊物上发表过。收入本书时，只在文字上作了些许改动。每“篇”中的文章，大体是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的，为的是能较好地反映我的工作和研究的进程。

关于书名，曾费过一番脑筋。曾考虑用《研究与实践》，因为我的研究成果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但这个名称缺乏特点，放弃了。还考虑过《七年踪迹》，本意是这本书反映了我七年工作的方方面面，但又怕读者会从狭义上理解“踪迹”，以为是记者到处采访留下的足迹和成果，因而也放弃了。最后，用了《广播电视探析》。虽然我也不大满意，但似乎还说得过去，因为它至少可以让读者一看便明白这主要是研究广播电视的著作。我想，不管用什么名字，这本书确实反映了七年来我工作的方方面面。由于我身处政策法规司主要领导岗位，而我司又分管广播电视系统的研究工作、法规工作，因而本书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法规司和整个广播电视研究战线的工作进程和工作业绩。从这个意义上看，《广播电视探析》有难以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到今年12月18日，政策法规司就满10岁了。在这期间，我把这本文字献给读者，一是为了向10周年献礼，二是为了

把前一段的工作做一番回顾、小结，三是为了考虑今后还能做些什么。今后做些什么呢？似乎到了该自我规划一下的时候了。规划什么呢？有一点是清楚的：现在我已经做的只是应当做的很小的一部分，许多任务和设想还有待大家进一步去实现。我会为广播电视继续贡献微薄之力的。因为我说过，我这辈子许给了广播电视。

1992年5月27日于北京

目 录

自 序

视听研究篇

什么是新闻·····	(3)
我国广播电视工作改革·····	(5)
国际广播的性质、功能、任务·····	(16)
国际广播的对象和题材·····	(22)
国际广播的报道方式与技巧·····	(37)
正面宣传与非正面宣传不可混淆·····	(43)
关于主持人节目的几个问题·····	(46)

决策研究篇

促进录像文艺片生产推动我国录像业健康发展·····	(55)
对农村广播电视建设的几点认识·····	(69)
试议“四级办”方针的“完善”·····	(80)
浅谈管理体制上的两大问题·····	(89)
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几点看法	
——赵水福与本刊编辑问答录·····	(99)

原则和特点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	
电视的理论和实践的初步概括·····	(106)
广播需要增强凝聚力·····	(109)

是认真研究、对付“和平演变”的时候了·····	(112)
试议广播电视改革的思路 and 重点·····	(115)

研究工作篇

谈谈政策研究室的性质与任务·····	(123)
把代代相传的《年鉴》编纂好·····	(126)
参加《中国广播电视学》研讨会想到的几个问题·····	(136)
关于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筹备工作的报告·····	(141)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工作的美好开端·····	(150)
广播电视学会要搞研究、出成果·····	(156)
有组织、有计划地抓好决策研究·····	(159)
是检阅也是推动	

——写在我国第一本《广播电视决策研究

文集》出版之际·····	(163)
关于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167)
对办好《声屏世界》的几点建议·····	(170)
在大型画册《半世纪的历程》首发式上的讲话·····	(174)
适应新的形势做好研究、立法工作·····	(178)
开创广播电视受众工作的新局面·····	(181)
把广播电视研究推向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的新阶段	

——写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出版之后·····

(188)	
我部需要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192)
为《广播电视决策参考》写的“编者的话”·····	(200)
为《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十年工作成果	

辑要》写的“前言”·····

(202)	
联合起来，把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推向新阶段·····	(207)

新闻自由篇

西方国家新闻自由探析·····	(219)
什么是新闻自由·····	(236)
划清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与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 界限·····	(238)
正确认识两种不同性质的新闻自由·····	(251)
掌握“必然”的新闻活动才有“自由”·····	(261)

苏联传媒篇

列宁为什么提倡“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	(267)
列宁与《经济生活报》·····	(270)
列宁是《真理报》的主要创办者和领导人·····	(276)
布哈林与《真理报》·····	(282)
苏联广播电视考察报告·····	(295)
苏联电视广播机构改组·····	(314)

视 听 研 究 篇

什么是新闻

什么是新闻？资产阶级新闻学和无产阶级新闻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明显不同。

资产阶级新闻学认为：“新闻是合理的谣言”，“新闻是新奇的事物”，“一切可惊可喜之事谓之新闻”，“不好的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正常的事情不是新闻，反常的事情才是新闻”，……

无产阶级新闻学家不同意资产阶级新闻学家的看法，认为新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头脑对现实生活反映的一种形式。他们强调，新闻报道不能以主观想象和主观爱好为根据，应以事实为根据。先有事实，后有新闻。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是新闻的本源。

新闻要让事实说话，要报道真人真事，要报道这条新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人身上、事情的经过和结果如何。对于事实，无论是整体还是细节，都不能有任何的虚构、歪曲、夸大、缩小、挪动或者代替。新闻不能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物身上的不同事件捏合在一起，虚构出一个新的情节，或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典型形象。那样做，新闻就不存在了，变成了另外的体裁。因此说，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新闻报道的事实，不是静止的事实，而必须是变化中的事实。而且细微的变化还往往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引起人们兴趣、值得发布消息的总是比较重大的变化。譬如地球在不

停地旋转，这并不构成新闻，要构成新闻，必须要有某种异常的、激烈的变化。对于人物、事件、成就、经验、情况、问题等等的报道也是如此，也要看有没有新的重大的变化，司空见惯的一般化的事实不应当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

新闻报道的不是很久以前发生变化的事实，而是新近发生的（或新近发现其变化的）事实。新闻不是叙述陈旧事物的教科书。新闻不新，必然削弱甚至丧失新闻价值。新，是新闻的个性，是新闻的灵魂。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新近发生的事实不可胜数，不能（也不应该）都成为报道的对象。这时，新闻机关总是按照自己的标准选择自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加以报道。新闻单位选择什么，怎样表达，直接受到立场、观点、目的的制约，从而使新闻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在我们国家，新闻机关总是挑选典型的有社会意义的重要事实进行报道，而报道的目的与世界上任何一家新闻机关一样，都是为了影响宣传对象和社会舆论。

新闻是报道最近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

（原载《对外广播通讯》1985年第2期）

我国广播电视工作改革

一、重视经济问题报道

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领域出现了大量新鲜事物。传播这些新鲜事物，反映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已成为广播电视部门的重要任务。

经济新闻在广播新闻、电视新闻里占有重要地位。中央电视台的第二套节目是以传播经济信息为特点的综合性频道，它每天有40分钟的经济信息节目。此外，还办有《科技与星火》、《农业科技》等专题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经济问题报道在整个新闻报道中约占1/3。除《新闻联播》等综合节目播送经济新闻外，它还陆续办了《来自企业的报告》、《企业家谈改革》、《厂长经理谈承包》、《青年企业家》、《经济信息》、《优质名牌产品展播》等专栏节目来报道经济问题。这家电台在经济问题的报道上，一开始着重抓思想观念的转变，为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消除思想障碍；接着着重抓典型经验；目前主要报道沿海经济战略问题。电台、电视台力求把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渐进过程来报，既报道成就，也报道问题。

为了更好地报道经济问题，广东、上海、辽宁等省市台还先后开办了经济台。经济台的主要任务是传播经济信息。广东省珠江经济台成立一年中，为企业家提供信息咨询、促成交易的金额达570万元。据反映，这家电台初步做到了“生产者的助手，经营者的参谋，消费者的知音。”几家经济台

虽然成立不久，但都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受到普遍的好评。

经济报道的成就在节目和稿件的评奖中也反映出来。拿1986年广播节目和稿件的评选来说，荣获特等奖和一等奖的15条新闻中，报道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有7条，约占47%；荣获特等奖和一等奖的新闻性专稿中，反映改革的题材约占45%。

二、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要问题经人民讨论

贯彻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政府很强调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要问题经人民讨论。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国广播电视部门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一点努力。

1. 公开报道重大的党务政务活动

我们可以举几个事例：

（1）关于企业“破产”问题的讨论

1986年我国国务院起草了“企业法”，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会上，委员们对有关企业破产的规定意见不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没有通过，建议修改后再议。这种情况在人大常委会上是少见的。人大常委会上的这场争论要不要报道？常委会和我们广播电视部门一致认为应当公开报道。结果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作了专题报道，通过形象和声音向公众如实地反映了会上的各种不同意见。其后，国务院修改了“企业法”，在报纸上公布于众，让人民讨论，然后再次修改。电台、电视台公开报道了决策的整个过程。这件事，在我国，被认为是新闻报道增加透明度的重要标志。

（2）关于八次记者招待会

1987年，新闻改革首先被人提起的是关于八次记者招待